

#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 中國基督徒人數之爭的學理與「政治」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HUANG, Jianbo;ZHAI, Jiexia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ISCS)
Download date	2026-07-08 04:15:55
Link to Item	<a href="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4534">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4534</a>

## 中國基督徒人數之爭的學理與「政治」<sup>1</sup>

黃劍波

中國人民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中央民族大學哲學博士

翟杰霞

美國俄亥俄州邁阿密大學社會學及老年學系助理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哲學博士

中國歷史上曾有過關於基督教信仰與中國文化的「禮儀之爭」，它深刻地影響了後來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最近幾十年也出現了一個令人關注的爭論，即關於到底中國有多少基督徒，各種看法可以說大相逕庭，少則一、兩千萬，多則達到甚至超過一億。而且，數據採用各方堅持自己的說法，拒絕和批評其他數據，一個本來或許可以更為簡單的數字問題成為極其複雜的學術問題，以至政治問題。對此，我們或可稱為「數字之爭」，儘管這個爭論與當年的「禮儀之爭」性質完全不同，也沒有甚麼可比性。

需要說明的是，考慮到在中國基督教與天主教通常被作為兩種不同的宗教被認知和統計，甚至在國家層面並列為五大被認可的宗教之中，另外，基督教在人數上以及發展勢頭上都明顯超過天主教，因此，我們的討論主要集中在

---

1. 本文的討論和構思開始於二〇〇七年至二〇〇九年兩位作者在貝勒大學宗教研究所 (Institute of Religious Studies, Baylor University) 做博士後研究期間，在此特地向斯塔克 (Rodney Stark)、約翰森 (Byron Johnson)、門肯 (Carson Mencken) 等教授致謝。

於被稱為基督教的「新教」，對於天主教信徒人數的討論則僅會簡單提及。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對於這個所謂「數字之爭」，更值得關注的或許還不僅僅是這些數據本身，而是這些數據的來源、收集和形成過程，所反映的社會政治立場和數據採用各方使用的話語體系，以及它在被解讀的過程中可能產生的意義或暗示（implications）。因為，無論喜歡還是不喜歡，承認還是不承認，基督教的快速發展已經遠不是「一個宗教」的問題，甚至已經不是一個「宗教的問題」，而是一個更大的社會議題，甚至一個政治議題。

### 一、數字的生成：來源及問題

關於當前中國基督徒的數量，一向有很多不同的說法，而且彼此的結論相去甚遠。從中國官方一般被認為偏少的說法，到海外基督教機構一般被認為偏多的說法這兩端之間，存在各樣的數據。其實關於天主教信徒人數的看法也很類似，差別非常大，例如根據一九九七年《白皮書》的官方數據是四百萬，而西方教會機構的推測一般認為超過八百萬。經過十多年的發展，目前能看到的官方數據一般認為中國天主教徒大約為五百六十萬，而民間數據則達到一千二百萬（香港天主教聖神研究中心），甚至兩千萬。

儘管存在具體數字之間的嚴重分歧，以及對這些數據的解讀上的顯著分野，但在過去幾十年來中國基督教出現了一個令人震驚的快速發展或「大復興」，卻是一個各方都承認的社會事實。就算按照普遍認為偏低的官方數據，從一九四九年的七十萬左右，到一九九七年的一千萬左右，<sup>2</sup>不到五十年間中國基督教增長了十五倍左右。而且，

---

2.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宗教信仰自由狀況》白皮書（1997年10月）。

我們不能忘了在基督教取得極大發展的這五十年中，中國社會經歷了多次政治運動，包括（至少希望）完全消滅宗教（包括基督教）的十年文化大革命。

這種增長不僅在絕對數字上令人驚訝，在總人口的比例上也有明顯的增加，從一九四九年的大約五百七十分之一（按總人口四億計），到一九九七年的大約百分之一（按總人口十二億計）。按照二〇一〇年八月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發佈的最新調查數據，中國有兩千三百零五萬基督徒，佔中國人口的比例百分之一點八（按總人口十三億計）。如果我們接受這兩個數據的話，那就意味着在這十餘年之間，中國基督徒再次出現了「倍增」（從「一千萬左右」增長到了兩千三百零五萬）。

關於為甚麼官方數據可能偏低，關鍵原因之一就在於其數據收集的途徑和方法：基本上是倚重各級準官方的宗教機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及基督教協會，通常稱為「兩會」）向相應的宗教局提交數據，然後匯總到國家宗教局，經過評估和測算之後拿出的數據。這種俗稱為「數人頭」的簡單疊加方式嚴格來說並不是完全不可行，甚至有人認為這樣出來的數據或許比那種在總人口中按照抽樣調查出來的信徒比例數據還可靠一些，但是在操作起來卻是問題重重。一個最直接和簡單的問題就是，原始數據是否可靠，也就是說，是誰在數人頭，是怎麼數的，又是怎麼報的，是否存在漏報、瞞報、虛報，甚至捏造等情況。與此相關，一個類似的問題就是：是誰在匯總這些數據，有沒有出現因着某種非學術的考量而對數據進行處理的情況。

就我們所見，由於各級兩會通常將宗教局的領導和管理傾向於理解為「促退」宗教，因此在有意無意中會將信

徒數字往小了報告。例如，前國家宗教局長葉小文的文章非常明確地提到宗教工作的目的最終是要達到壓制宗教的發展，他說，「我們不能用行政力量去消滅宗教，不等於我們就贊成、甚至就用行政力量去發展宗教。不管是自然、間接也好，還是迂迴曲折也好，我們總還是希望逐步削弱宗教的影響」。<sup>3</sup>當然，這當中可能存在一些地區和個別兩會的例外，即為了增加自己的談判能力和價碼，可能將信徒數位進行誇大。但就總體來說，我們認為整個數據上報和彙集過程仍然是以縮小數位為常態。我們姑且不去討論和假設宗教管理部門對於數據的非學術的處理，實際上，這些原始數據的一定程度上的任意性（無論是偏多，還是偏少）從源頭上就破壞了這種數據收集和形成模式的可靠性。因此，在一九九六年的白皮書中得出的數據為約一千萬。之後這些年儘管沒有白皮書之類的官方正式檔，但通常認為官方認可的數據是一千六百萬到兩千萬，例如根據中央政府門戶網站關於「基督教」的介紹（2005年7月26日發佈）：

據基督教全國「兩會」統計，我國信仰基督教的人數達1600萬，教堂及活動點總數超過5萬個，有近3000名牧師、1.5萬名教職人員和近11萬名義工。全國有18所神學院、聖經學校，其中金陵協和神學院為全國性的神學院。共出版發行3000多萬冊聖經、1400多萬冊《讚美詩（新編）》。<sup>4</sup>

這裏需要提到的是，儘管中國官方從來沒有正式承認過「家庭教會」的存在，事實上，前全國基督教三自愛國

3. 葉小文，《宗教問題怎麼看怎麼辦》（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頁136，原載於中央黨校《報告選》5（1996）。

4. [http://www.gov.cn/test/2005-07/26/content\\_17214.htm](http://www.gov.cn/test/2005-07/26/content_17214.htm)（瀏覽於2008年7月30日）。

運動委員會主席季劍虹長老曾經因為宣稱「中國沒有家庭教會」而引起不小的爭議。但是，在中國官方的基督徒數據中，卻隱含地包括了部分家庭教會的信徒，儘管那也可能只是估算的數字而已。這一點對於理解海外基督教機構的誇大數據的推斷的方法論非常重要，因為一般來說，這類機構或個人傾向於認為中國的官方數字僅僅涵蓋了三自體系之內的教會，而未將廣大的未被正式認可的非登記教會計算在內。而一般認為非登記教會的信徒人數大致與官方認可教會相當，甚至有人認為可能是其兩倍或三倍以上。

因此，如果相信非登記教會的信徒人數相當於三自教會體系，那麼一個自然的結論就是將官方的數據乘以二，從而得出大約四千萬這個數據。而如果相信其為三自教會的兩倍，則乘以三，從而得出六千萬的數據。而這大概要算是目前被多數人所接受的一個觀點，至少最經常被人使用。當然，如果相信其為更多的倍數，則最終的估算數值則相應增加，直至超過一億這樣的看法，而這就意味着要接受非登記教會的人數大致是三自教會的五倍這個假設。或許在一些特定的地區，這個假設是可以成立的，甚至可能出現非登記教會十倍於三自教會的情況，但是，當把這個假設推廣到全國範圍的時候，就會出現很大的困難。

前面提到官方數據的來源和處理方式存在局限，但這種所謂民間數據也同樣存在方法上的問題。需要指出的是，這樣一種計算方式有兩個基本假設，首先是對中國官方數據的不信任，其次則是相信官方數據沒有包括非登記教會。這兩個假設或許都能部分成立，但其數據產生過程的任意性和不可靠性也是顯而易見的。就目前所知，發佈和採用這些數據的各方面幾乎都沒有非常明確地把自己的數據來源和方法提供給公眾，但就所知的情況來說，他們

所採用的方式其實與官方統計的方式是很相似的，即基本上也是一種「數人頭」的簡單疊加，區別不過在於官方數據的來源是各自兩會機構及宗教管理部門，而這些民間數據的來源則主要是各地教會的自報，以及一些機構或個人根據自己所能看到的教會情況和所收集到的材料的分析和估算。

我們注意到，海外基督教機構的數據來源通常是宣教機構，而這些宣教機構出於籌款等實際原因的考慮可能存在抬高自己所服務和接觸到的基督徒的數量，從而作為自己事工果效的一種證明，或者至少作為自己合法性的一種注腳。另外，就算將這種或許落為揣測人心的誅心之論放在一邊，由於很多宣教機構可能交叉接觸到同樣的中國基督徒群體，從而出現重複計算的問題。我們也不得不意識到的另一個問題則源自海外機構和教會對於中國教會發展的美好願望，以及他們將自己在某一局部看到的一些超乎尋常的復興推廣為全國性的普遍現象的集體無意識。

需要注意到的另一方面因素在於，家庭教會，特別是那些較大的家庭教會系統，一方面可能存在主觀上誇大自己的信徒數位的情況，特別是在爭取海外支持的時候，一些聲稱擁有數十萬、甚至數百萬信徒的教會很有可能存在這種情況。如果說這種猜測也有誅心之論的嫌疑，但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由於其教會形態而可能會產生教會以及信徒被重複計算的情況，因為這種類型的教會構成儘管也有完全自己建立的地方教會，也有大量的情況是收編已經存在的其他地方教會。在一些教會系統的做法中，只要曾經受過自己教會系統的牧養，甚至可能只是一些培訓，就把它計為自己的教會系統的教會和信徒。

其三，對於大量鄉村教會來說，這也正是中國基督教

信徒構成上的主體，在計算信徒人數的時候一般來說並不是按照「個體」為單位，而傾向於以「家戶」為單位。這樣的計算方式顯然也會與實際的信徒人數有差距，出現偏高的情況。而且，對於這種類型的教會來說，相當一批其實都是在名義上掛在三自教會下的，儘管其實際運作基本上是完全獨立的。實際上，這種被一些人稱為「不三不四」的教會不僅存在於廣大的鄉村教會，在一些城市地區也時有出現。這種或許可被歸為「灰色市場」的存在也就會對我們剛才提到的民間數據的第二個基本假設產生影響，<sup>5</sup>也就是說，官方在統計中國基督徒人數的時候至少已經可能納入了部分的「家庭教會」信徒，或者說已經考慮到這部分信徒的存在。當然，這裏我們再次看到所謂「家庭教會」一詞本身的含混性，在此暫不展開討論。

## 二、數字之爭的學術與「政治」

儘管我們對於那種嚴重偏低或偏高的數據產生過程有所疑慮，但是我們仍然欣賞他們試圖得到一個基本數據的努力，簡單來說，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實上，幾乎所有人都承認宗教信徒（基督徒）的人數調查，特別是在中國，幾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事實上，甚至那些似乎更為客觀的民間數據其實與官方數據一樣，需要面對同樣的質疑，即其原始數據的來源及數據處理和分析過程。就算我們不接受那些過億的超高說法，而接受六千萬左右這一模糊的更接近中國式的中庸數字，問題其實還是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決，即我們前面提到的所有這些數據儘管都有自己的一些依據或可靠性，但其產生來源和過程多有猜測和推斷，缺乏系統的有現代社會科學依據的統計數據。

---

5. 參見楊鳳崗，〈中國宗教的三色市場〉，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6（2006），頁41-47。

應該說，這些年來一直有一些相關機構和個人在這方面努力，其中值得提到的有二〇〇七年貝勒大學（Baylor University）委託零點調查公司展開的一個全國性的宗教調查（在此簡稱貝勒數據），以及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二〇一〇年十月剛發佈的全國性的基督教專項調查（在此簡稱社科院數據）。按照社科院數據，中國基督徒佔人口比例的百分之一點八，推算人數為兩千三百零五萬。在社科院宗教所發佈的《2010年宗教藍皮書》中對於該調查的方法及過程的說明中，提到這是一項「抽樣調查」，並在方法上主要是強調了其「入戶」調查的深度，以及「全國性」的廣度。就目前來說，貝勒數據大概是已知的宗教調查中在抽樣設計和數據收集方法上最為接近現代社會科學規範的一個努力，其中一個例證是其數據已經得到國際學界的認可和使用，並已在一些學術刊物中發表了幾篇基於這個數據的研究論文。有意思的是，它所發佈的數據認為中國基督徒的人口比例大概為百分之二點三，而這與社科院數據比較接近。但由於貝勒數據所顯示的中國天主教的人口比例僅為百分之零點二，而這甚至還低於普遍認為偏低的官方數據，因此也就帶來了對其整個數據的質疑。儘管任何數據可能都存在瑕疵和偏差，但按照翟杰霞和黃劍波根據貝勒數據撰寫的一篇文章的分析，中國基督徒（包括新教和天主教）的人口比例應該不會超過百分之五，按照十三億的總人口推算的話，大約為六千萬。<sup>6</sup>

然而，需要承認的是，關於基督徒的人數，甚至如何獲得關於其人數的數據本身，除了學術之外，還有各種的「政治」因素摻雜其中。事實上，當貝勒大學計劃開展一

---

6. Jiexia Zhai & Jianbo Huang, 〈中國的基督教的實證性反思〉（Empirical Reflections on Christianity in China; manuscript in preparation）。

項關於中國宗教的全國調查的時候，由於作為一個國外學術機構不能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搜集大型數據，因此只能選擇與國內著名的民間調查機構零點調查公司合作，並且用「中國城鎮居民精神生活」為題來對其宗教研究的目的稍作掩飾。儘管我們知道在英文中“spiritual life”一詞可以是非常「宗教的」，而且在此次調查問卷中大量涉及制度性宗教之外的宗教或信仰觀念及實踐的問題，但在中國語境中「精神生活」卻是相當含混的表達。無論如何，如果說之前我們在批評一些海外相關機構的偏高數據時可以指責其「用心險惡」，那麼我們顯然不能用同樣的說法來處理貝勒大學及其發佈的數據，因為它確實是一間得到相當認可的研究機構，同時其研究方法和研究過程也相當嚴謹，儘管不乏疏漏及可進一步討論之處。但是，儘管是一間獨立的學術機構，貝勒大學本身作為一間有浸信會傳統的私立教育研究機構，仍然會給人留下懷疑的空間。而且，要在中國展開這樣一項眾所周知的政治敏感度極高的研究課題，作為一個海外機構，本身就具有了一種「原罪」。

有意思的是，就國內的情況來說，正是看到了基督教的快速發展作為一種必須正視和恰當處理的社會議題，甚至政治議題，不同政府部門紛紛展開了不同級別、不同範圍的專項或綜合調查。儘管之前也有類似的各種調查，但二〇〇三年的「一書一碟」<sup>7</sup>之後，顯然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所謂級別或經費投入上都有了極大的提高。其中比較重要的包括國家民委委託中央民族大學主要在少數民族地

---

7. 指艾克曼 (David Aikman) 的《耶穌在北京：基督教如何改變中國及全球權力之平衡》(*Jesus in Beijing: How Christianity is Trans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 Washington, D.C.: Regnery Publishing, 2003) 一書及遠志明的《十字架》系列光碟。

區展開的調查，<sup>8</sup>國務院政策研究中心民族發展研究所主要針對家庭教會展開的全國選點調查。<sup>9</sup>儘管這些努力都值得稱道和尊敬，但也已經有人指出這些官方或半官方的調查仍然難以避免外界的批評，因為還不夠「獨立」，還不夠「學術」。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當二〇〇七年三月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推出其中國宗教信徒數據達三億的時候得到了海內外的廣泛關注和討論，儘管其研究方法和結論後來受到較多的質疑，但海內外輿論顯然比較重視和歡迎一個國內的獨立的學術機構就這一問題展開研究。

然而，在中國社會中，要展開關於宗教（基督教）調查還必須處理好另一個可以說更為廣泛存在的「政治因素」，即社會政治環境以及其中生活的人群所體會到的「結構影響」。例如，在所有號稱有着科學的抽樣設計並嚴格執行的調查中，一個不得不提到台面上的問題就是：部分宗教信徒，或許特別是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對於信徒身份的隱藏，他們如此做的原因是不言自明的。而如果這樣的情況是廣泛存在，而不僅僅是一種特例的話，那麼我們所得到的數據，以及由此而做出來的所有分析都不過是一棟建在沙灘上的大廈。我們這麼說並不是在消解科學研究的意義，事實上，我們欣賞已有的所有研究努力，並歡迎和鼓勵看到更多高品質的研究出現。正是基於這個理由，我們期待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系正在展開的全國性宗教問卷調查（作為全國綜合社會調查 CGSS 的一部分）能在近期發佈一個「人民大學數據」。

---

8. 參看遊斌等，〈多元民族文化中的基督教——基督教與雲南少數民族調查報告〉，載《金陵神學志》（2004）。

9. 參看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在北京召開的據稱為國內關於家庭教會的第一次公開學術會議相關調查報告。

### 三、數字的解讀：立場及關懷

前面提到，中國基督徒大約六千萬這個說法似乎已經成為不少學者所能接受的數據，甚至在官方媒體《中國日報》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三日刊登的對有着「民間宗教局長」之稱的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劉澎的專訪中所援引的數據也大致與此相當。儘管我們不能就此認為這就意味着官方接受了這一數據，但這一舉動本身已經給人相當多的想像或引申的空間。事實上，在一些相關評論中就提到，在官方媒體中討論家庭教會這一議題本身就可能意味着政府對於家庭教會態度的轉變，也就意味着相應的宗教政策的改變。然而，也有一些評論對這種簡單樂觀的分析提出警告，認為這不過是官方出於國際形象的考慮而發出的煙霧彈，因為作為一份英文報紙，《中國日報》顯然不是面對普通的中國讀者的。當然也有一些評論比較持中，一方面表達出一種謹慎的樂觀，認為這還不能證明政府已經有了明確的態度，而更有可能是在拿出一個更清楚的看法及應對辦法之前對於問題的了解。同時也對此表示歡迎，因為無論如何，這表明政府高層在認真考慮這個社會或政治議題，也表明他們在處理這類問題時比之過去更為謹慎、客觀、實際的思路，而不是那種意識形態指導下的簡單否定和壓制。

事實上，這種對同一數據，以及對數據的發佈過程本身的不同理解正好反映了這議題的複雜性，也正好反映了不同解讀者的不同立場和關懷。而這也正好可以作為我們理解關於中國基督徒數字的爭論本身的大背景。換言之，不同立場或關懷可能會導致不同數據的產生，同樣也會導致對不同數據的解讀。

例如，同樣是面對基督教在近三十年的快速增長，對

於主管宗教事務的官員和海內外基督教會及信徒，就有着完全不同的意味。對於政府官員來說，這有可能是一種壓力，說明自己的工作做得不夠好，不到位。當然，有意思的是，這同時也可能意味着一種機會，可以在本來比較邊緣的政府架構中獲得更多的重視，爭取更多的資源。

然而，對於基督徒來說，這卻顯然意味着「大復興」，甚至是教會歷史上從人口規模來說最大的復興，因而自然是滿懷對其上帝的感恩，在為之興奮的同時可能也更加映證了其信仰的合理性。對於其中關注社會政治議題的教會或信徒個人來說，這或許也就意味着他們應當並且有可能更為積極主動的參與到社會中來，至少增加其在社會大眾面前的可見度（visibility）。但是，我們也注意到，對於海內外不同類型的教會、機構或個人，這個復興，特別是其不同的復興程度，其實也有着不完全一樣的意義。

例如，在前《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駐北京高級記者艾克曼（David Aikman）的《耶穌在北京》（*Jesus in Beijing*）一書中，他在書的結論部分對於基督教對於中國社會的可能影響的討論提到，中國在不久的將來就會成為一個基督教的國家，並因此成為美國的重要盟國。儘管多數人對於他在書中所描述的內容本身異議不多（當然也有人批評他的記述中不夠全面和準確），但相當多的中國基督徒雖然樂見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信徒的增加，教會的建立，卻並不同意他最後的那個從美國政治利益出發的推論。實際上，不少基督徒其實連「基督教國家」這個概念本身就是持懷疑態度的，不僅是指懷疑其可能性，甚至包括懷疑其可行性（或是否合符《聖經》）。

我們也注意到，對於基督教會及基督徒來說，對不同數據的接受也就可能意味着對其教會現狀及其社會處境的

不同理解，從而帶來不同的行動方式。所謂量變引起質變，中國基督徒的人口比例是百分之一，還是百分之十，顯然其意義是完全不同的，何況還有人預言在不久的將來將會更高。而一般認為當基督徒人口超過百分之二十五的時候，整個國家的社會結構和文化氛圍都會出現巨大的變化。當然這主要是以韓國的經驗為參照，是否成立尚待考察。然而，無論如何，採信不同的數據，顯然可以反映和表達非常不同的情緒。

以普遍認為嚴重偏高的一億多的這個數據為例，採信者就極有可能認為中國基督教的發展正處於一個歷史性的黃金時期，從而在一片歡騰的盲目樂觀中忽略掉了其真正的社會現實：政治上被懷疑，社會上被忽略，文化上被邊緣，以及其他宗教特別是佛教的競爭。當然，對於這一數據持否定態度的人還從另一個角度提出，如果中國基督教真的已經達到甚至超過一億，那麼為甚麼整個文化還幾乎感受不到基督教的影響，整個社會還看不到基督徒的在場，除了主流媒體的有意無意的不予報導之外，是否也意味着中國教會也存在着嚴重的問題，亦即僅僅有數量，而無品質，或者說，「僅有信徒，而無門徒」。

#### 四、結語

簡言之，關於中國基督徒的「數字之爭」本身所反映的不僅是研究方法和分析模式的所謂學術問題，也反映了數據獲得途徑上的限制和問題，以及與此相關的社會政治環境以及其中所生活的人群所體會到的「結構性影響」。另外，我們還必須注意到研究者或使用者在不同的立場上，以及出於不同的關懷，對不同數據的解讀，以及對社會現實的判斷和相應策略的採用。

我們也注意到在龐大的人口基數及當下的社會環境中要用「數人頭」的方式來累加出基督徒人數，或其他類似數據，都是靠不大住的，也是不現實的。因此，或許重點並不在於一個準確的數字本身，按照基督徒的說法，那或許是一個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事情。但這樣說並不意味着我們不能，也不應該期待有更能反映現實狀況的研究，事實上，與此相反，我們歡迎在研究方法上更為符合現代社會科學規範的任何研究，無論研究者自身的立場或態度是甚麼。畢竟，這也是一種求真的過程，至少是一種努力。

**關鍵詞：**中國基督教 數字之爭 調查研究 社會處境  
政治意義

作者電郵地址：huang2005@ruc.edu.cn（黃劍波）

zhaij@muohio.edu（翟杰霞）

# The Reasoning and Politics of the Debate on Christian Population in China

HUANG Jianbo

Ph.D.,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Anthrop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ZHAI Jiexia

Ph.D.,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and Gerontology

Miami University (Ohio)

## *Abstract*

The number of Christians in China today varies widely from about 20 millions up to more than 100 millions. It is important to know how these figures come up, and even more to understand why different agents release and insist their versions of this particular issue. The statistics is not purely an academic activity, but involves many complicated social, cultural, and political factors.

**Keywords:** Christianity in China; Debate on the Figures;  
Survey; Social Context; Political Implications

